

# 专栏：腐败感知：基于两岸五城的实证研究

## 专栏导语：公众感知、问卷调查与腐败研究

公 婷\*

近年来，腐败问题受到社会普遍关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也发表了不少关于腐败研究的论著。现有的腐败研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切入，对腐败问题作深入剖析，以求对其成因、形态和影响有更全面与深入的认识。可是，尽管研究成果颇丰，学界在腐败的定义与测量上仍无共识。而腐败的定义与测量是腐败研究的基础和关键所在。毫无疑问，腐败的定义随着环境与文化的差异与演变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定义腐败的困难以及腐败行为的隐蔽性和复杂性为腐败的测量增加不少困难。虽然学者们在努力寻找各种方法更“客观”地定义和测量腐败，但定义与测量的标准、方法的选择往往具有较强的主观性。然而，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测量主观的腐败感知要比了解腐败的客观水平更为重要。例如，即使真实的腐败水平并不严重，个别重大腐败丑闻会对政府施政产生普遍的负面影响，降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测量和研究民众对腐败的主观看法与感知就显得格外重要。

为测量腐败，可以多种方式来收集数据，如公开的跨国调查问卷或是定性的经验事实材料（如访谈、采集媒体报道和研究对象公开的文件等）。但是，在现有国际国内文献中，通过第一手问卷调查来采集数据进行腐败研究的并不多。这可能是出于研究成本和便利性的考虑。但是问卷调查不仅是腐败研究不可或缺的数据收集方法之一，与其他资料收集方法相比，它更有其优势。第一，腐败会严重侵蚀民众对政府和国家的信任与态度，严重时可能会导致信任危机。因此，了解广大民众怎样看待腐败，如何评价政府的反腐败工作便十分关键。民众的态度和看法对政府的政策制定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要了解民众对腐败的态度与看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问卷调查。有效地利用问卷调查可以很好地描绘出民众对腐败态度的“晴雨表”。第二，腐败研究有不同的视角，通过问卷

\* 公婷，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

调查深入了解民意，对反腐败的成效有直接的影响。建立有效的制度固然是预防腐败的关键，但反腐败的努力不可能脱离民众的支持与参与。采用问卷调查是了解民众在反腐败问题上的态度与取向的最好方式。第三，从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人加大了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力度，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这些成果很直观地反映在国家打“老虎”与拍“苍蝇”的数量上。但是政府的努力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民众的支持？政府的努力又是怎样影响了民众对腐败的看法？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问卷调查能够帮助我们获得相关数据，比较准确地回答上述问题。

本专栏以“公众感知、问卷调查与腐败研究”为主题，向读者推荐四篇文章。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问卷调查方法研究腐败，集中探讨民众对政府清廉水平的评价，对社会腐败水平的感知，对腐败的容忍度，以及参与反腐败的行动意愿等问题。四篇文章在不同地区获取第一手实证数据，通过科学分析，得出了各具特点而又富有启发意义的结论，对学者和决策者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倪星、孙宗锋和李珠的文章比较民众对不同层级政府的清廉水平的评价。基于2015年的全国性调查数据，他们发现中国存在“中央高—地方低”的差序政府清廉感知现象，也就是说，民众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省、地级市、县市区）的清廉水平看法有明显差异。他们提出影响市民对中央与地方政府清廉感知差距的三个主要因素：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民众对地方政府的腐败容忍度，以及民众获得腐败信息的途径和腐败经历。通过对全国83 305位民众的电话调查数据，他们的回归分析结果证实：地方经济发展越高，受访者越不会认为中央政府会相对清廉；腐败容忍度越高，越觉得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要清廉；腐败信息曝光越多，越不会认为中央政府更清廉。这个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样本量大，是国内罕见的关于腐败问题的大型全国性调查。

余致力和庄文忠的文章以台北与高雄两市共2140份问卷调查为依据，探讨了如何测量与解释民众对贪腐的感知。他们讨论了腐败的定义。毫无疑问，考虑到腐败的复杂性、隐蔽性及其感知的主观性，如何定义腐败是研究的第一步，也非常具有挑战性。该文讨论了现有研究是如何测量民众的腐败感知的，如基于网络的实验调查或对大学生的腐败容忍度的问卷调查。基于台北与高雄市的电话访谈数据，作者报告了两地民众对腐败的感知状况。整体来看，两地的腐败的容忍度虽总体较低但有差别。这篇研究进而讨论了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以及政党归属等在内的影响民众腐败感知的主要因素。

基于香港的调查，肖汉宇与公婷的文章则集中讨论了如何测量腐败容忍度以及检验哪些因素影响市民对腐败容忍度的差异。他们的数据来自于2015年对

1 025 位香港市民所作的入户调查。该文从三个方面测量市民的腐败容忍度：整体的腐败容忍度（被访者自我测定的腐败容忍度）、具体情境下的腐败容忍度（被访者在问卷设计的 11 种特定情况下表现出来的腐败容忍度）以及被访者是否愿意举报贪污腐败（通过行为意愿体现的容忍度）。虽然香港市民总体上的腐败容忍度极低，但这项研究也发现在程度上的差异。回归结果显示：教育水平、是否有过腐败经历和年龄等都是影响腐败容忍度的重要因素。

袁柏顺的文章关注腐败感知研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真实腐败水平与腐败感知之间存在的差距。现有的研究表明，腐败真实水平与腐败感知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个较大的差距，也即，民众感知的腐败水平可能并不反映腐败的真实水平。有鉴于此，该文将“腐败感知”看作是“腐败传说”，进一步探讨哪些因素（如性别、教育水平、收入等）与人们的腐败感知相关。数据来源是内地 C 市 925 份有效问卷。文章发现，虽然公众认为腐败较严重，但是有真实腐败经历的民众却非常少，这说明“腐败传说”确实存在。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影响腐败感知水平的因素。

本专栏的四篇文章，对现有的腐败研究做出进一步的推进和贡献。第一，这些文章紧扣腐败感知问题，却又从不同角度切入，探讨不同社会环境中人们对腐败的感知，展示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文章分别涉及民众在看待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清廉程度上的差异，腐败感知与腐败经历之间的关系，腐败的定义、测量和影响因素，腐败容忍度的差异及其测量。第二，从资料的获得和研究方法来看，四篇文章采用问卷调查获得宝贵的一手实证数据，并采用定量方法探讨腐败感知与其他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而证实了定量分析在腐败研究领域中的优势。

希望本专栏的四篇文章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推动腐败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与细化。这四篇文章虽然关注不同的地区，但也为跨地区的比较分析提供了可能。我们将以这几个地区关于腐败感知的调查为基础，推动两岸三地多城市之间的比较研究，探讨不同地区的民众在腐败感知和反腐败行为意愿上的共性与特性，腐败感知与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的关联，以及腐败感知对反腐败成效所产生的影响等重要问题。

在中国，乃至全球，取得反腐败的成功可谓任重而道远。腐败问题的复杂和反腐败的艰难为腐败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和极具挑战性的课题。作为腐败研究的学者，本专栏的多位作者们进行了开拓性的尝试和卓有成效的探索。我们期待他们和更多的学者在不远的将来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